

穿过历史迷烟

问道明日中国

戴旭 著

戴旭讲 甲午战争

从晚清解体透视历代王朝的政治败因

人民日报出版社

戴旭讲 甲午 战争

从晚清解体透视历代王朝的政治败因

戴旭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戴旭讲甲午战争：从晚清解体透视历代王朝的政治败因 / 戴旭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115-5694-3

I. ①戴… II. ①戴… III. ①中日甲午战争—研究 IV. ①K256.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8133 号

书 名：戴旭讲甲午战争：从晚清解体透视历代王朝的政治败因

作 者：戴 旭

出 版 人：董 伟

策划编辑：陈 红

责任编辑：陈 红 刘天一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010) 65369844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220 千

印 张：18

印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5694-3

定 价：45.00 元

前言

以史为鉴—— 中国复兴征程上永远高悬着两面覆亡明镜： 晚清与苏联

有一个疑问始终困惑着我：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总是出现王朝更替？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血流成河的重复？

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个更重大了。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做客。毛泽东问黄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

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接着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地方的事，公之于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有效的。

这“周期律”其实就是中国历代政治的不治之症。本书从最新的一桩病例——晚清甲午战争失败及解体——开始解剖。

甲午病，即“老”病，或年老或心老，老则弱、则朽、则受辱、则死灭。如秦，虽只二世，尚属年轻王朝，但由于已失进取之志，故心志已老，腐朽败亡之气于是弥漫，朝内宵小横行，朝外陈胜吴广、项羽刘邦拔剑相向，结果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他如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均是如此。至于汉唐等一代盛世，在步入老年之后已不复青春光景，最后也不出内朽外乱的套路。

在每一个中国王朝的结尾，都能看到似曾相识的症状。久而久之，一看内政腐败蔓延，内部危机加剧，外患迫近，就知道王朝的末日不远。

晚清大学问家陈澹然在《寤言·迁都建藩议》中说：“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讲的是一种基本的战略思维方法，就是要从长远和全局出发，思考谋划当前的事情。拿破仑说：“战略是时间和空间的艺术。”异曲同工。

可惜的是，晚清当政者中，几无一人有这种思维和眼界，无法看清世界全局，根本不知道当时的世界格局什么样、世界潮流什么样，当然也就无法谋清朝发展和安全之一域，不知道中国已经在社会技术和政治、经济形态及思维方式上落后西方到什么程度。内政、外交、军事、改革开放，几乎各方面都出现根本错误。空间错位，时间没有不变形的，国祚遑论万世，王朝仅得残喘而已。

在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应始终高悬两面历史明镜——

一是晚清从闭关锁国到开放无度，未被军事消灭，却被西方政治理念颠覆。先是基督教文化入侵引发太平天国运动，后是西方宪政思潮引发革命党起义（这两次运动在推翻帝制方面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导致国家解体和外敌入侵），致使主要以发展经济、壮大国力，进而梦想抵御外侮的改革开放进程彻底归于失败。从军事方面看，晚清投入大量资金购买外国装备，引进生产线制造军品，编练新军，最后还是没有能够捍卫政权和国家。问题出在哪里？

二是苏联在经济停滞和政治迷茫中消亡，庞大的军队和军备形同虚设。因为采取社会主义制度，使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等巨大军事成就的同时，也成为政治上的超级大国。但是，此后苏联在发展理论上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困境，党失去了继续进取的意志，官僚贪于享乐，腐败盛行，民心悄然离散，军队不知跟谁作战。最后在内因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轰然解体。核弹世界第一、技术装备先进的庞大军队，完全没有发挥保卫党和国家的基本职能。问题出在哪里？

1947年，美国冷战教父之一的乔治·凯南，在那篇著名的八千字长电报《苏联行为探源》中，分析苏联内部有哪些缝隙可以让美国利用。凯南说，苏联高层的政治权力移交并不稳固：“一种巨大的不确定因素给苏联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阴影。那就是把权力从某个人或一批人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批人手中时的难以预测的局面。”

毫无疑问，这是苏联共产党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根本内因。迄今为止，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破解苏联共产党的这一致命死因。

没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时代是一帆风顺的，正如没有一个健壮的人不经过艰苦的锻炼可以成就。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无论是从克服周期律还是抵御外患的角度，警惕甲午病、治疗甲午病都是最根本的加强点。而若要如此，分析甲午病、诊断甲午病又是第一步。

中国历史最辉煌的时期，无一不是由武将或以军事手段开创。第一个中国王朝，就是由本名赵政的军人，即后来的秦始皇和平民（布衣）战略家尉繚共同筹划，由一批军人子民开创的。汉朝亦然。军人刘邦自不必说。其重孙刘彻，年轻气盛，勇武强悍，用了两个年轻军人，一个

十八岁，一个二十四岁，成就了汉武大业。唐朝，军人李世民接续辉煌。另一个军人成吉思汗，是少数民族中的佼佼者。

中国弱，多由文气。南唐后主，诗词绝佳，但被军人赵匡胤像抓小鸡一样抓来，其妃小周后，被赵皇帝当众“强幸”。但宋朝最后在另一个尚武王朝金国的进攻下，也重演了这一幕。根本原因，一在于文，二在于“钱”。有文化又有经济，两大繁荣，偏偏军事萧条，结果被四邻欺负，最后亡国。其实，宋朝出过很多优秀的军人，就是到了南宋，依然有岳飞、王坚这样的军事天才。如果皇帝有点军人气概，岂有亡国之理？但偏偏这位文皇帝厌恶军人——可能还害怕军人，于是杀岳飞所谓以儆效尤。国家士气全堕，不亡何待？军人，就是雄性、年轻的代名词。清朝一批军人建立王朝，几代之后懦弱不堪，被世界列强凌辱个遍。王安石说：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为什么？后世子孙没有先祖那股军人劲了。

发生在晚清的甲午战争让中国痛到今天，反思这场战争的文章多如牛毛，但很少有人说到点子上，倒是一个日本学者一语中的，他说：中国是文人统治，而日本是军人统治；文人对国家安全很迟钝，而军人则很敏感。所以，双方变法的动力不一样，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不一样，导致双方的政策不一样。最后，两个国家的命运不一样。

甲午战争就是一个老人和一个青年打架，结果不问可知。这老人家的一切都被彻底蹂躏掠夺。后来，日本小个子被另两个大个子青年打倒，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这世界永远是强者的世界。你是牛，再大的体积和重量，都不会让狼畏惧；你是老虎，百兽敬畏，不怒而威。梁启超有少年中国说，我愿中国人人皆青年。

引 言

甲午战争：清日改革成败的军事检验

晚清之衰自鸦片战争开始，而晚清“病危”则自甲午战争起。故，解剖晚清，甲午战争是最好的切入点。

观察甲午战争的结果，思考这场战争的败因，不应该只局限在1894年、东海、中国——日本海军战争这样一个狭隘的时空中，更不应该只是逢五逢十“仪式性”地纪念一番。因此，在大家都在说的时候我在听，在他们说完并且遗忘之后，我再说。

甲午战争只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失败战争中的一次，前面有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后面有八国联军进北京。晚清对外，几乎战无不败，穿插其间，多败一次又如何。

但国人为何独对此战耿耿于怀？

原因在于，从军事上和情感上讲，这是一场大国被小国单独打败的战争，而这个小国——日本历来被中国瞧不起。

此外，这一战对于晚清也是致命的最后一击，它以军事失败的结果，宣告了清朝洋务运动的改革失败。

我以为，研究甲午战争应该超越中国和日本的视野。就本质而言，那只是满清王朝与日本的战争，而满清王朝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真正的中日战争是后来发生的、以日本率先发动并最后放下武器投降而告结束的史称抗日战争的那场战争。故，我对甲午战争更多的反思是政治性和历史性的。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这场战争具有标本意义，值得反复解剖、探究。这同样是因为现实的刺激：因为当下的中国和当年的中国一样，处于改革的中途，而外部环境惊人相似。因此，寻找这场战争的败因其实就是为当前预警、为未来预防。

一、没有把握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特点，错失焕发生机、拯救亚洲的机遇

甲午战争之败，和晚清其他失败一样，首先都是败于没有世界眼光和全局意识，因此不知彼不知己。岂止是战争，晚清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是如此。

19世纪后期，世界正是丛林法则盛行、帝国主义大行其道的全球化战国时代。西洋列强挟工业化、全球化的巨浪，借助领先全球的军事

机器，全球扩张。内部，被拿破仑战争洗礼过的欧洲，又在酝酿第一次世界大战。

此时中国如果有人明了世界大势，他会发现中国已在技术形态、政治形态等社会的主要方面全方位落后。如果和这些列强发生对撞，则有亡国灭种之危，而如果巧妙利用列强厮杀，则可以借机图强。可惜，最后做到这一点的是日本。

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这就是日本对这个时代的回应。晚清不幸成为日本练刀的第一个祭品。今天看来，日本敏锐地抓住了19世纪世界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机遇，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无法无天，抢夺弱者，强者为王，有力则独霸殖民地，无力则共同瓜分世界，是那个世纪的政治生存“法则”。清朝由于对这一时代特点完全无意识，是世界大国中彻底丧失全部战略机遇的国家。原因是没有国家理想，囿于自我享受的金鱼缸政治。因此，作为亚洲的大哥，没有起到保护亚洲的责任，不仅逐步失去了琉球、越南、缅甸和朝鲜等一切势力范围，最后内部革命爆发，王朝覆灭，国家解体，几乎要步印第安人之后尘！

我们今天谈甲午战争，有现实意义，因为当年的战争各方，今天都在，都是大国，只是英国的角色由美国代替。美国和欧洲都在说，当前东亚的局势，类似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势能在蓄积。今天和19世纪末，在本质的地方还是一样，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日本在“二战”后采取韬光养晦战略，已经又实现了第二次明治维新。日本右翼还是想扩张。

二、盲目改革导致腐败爆炸式失控，内部利益哄抢招来外敌打劫

古人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甲午战争的失败，从总体上看是清朝改革开放的失败。

国家改革，改什么？

清朝的改革，首先是经济改革不知道改什么不改什么，到了政治改革的时候又不想改却不得不改，最后，被革命“洗牌”。

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的改革已基本完成。它是在三方面同时进行并同时完成的：一是经济——殖产兴业，二是政治——文明开化，三是军事——富国强兵。经济就是发展现代工业，政治就是建立现代开明的制度，军事就是要强大扩张。政治是方向盘，经济和军事是一对轮子。国家就这样前行了。

清朝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是不能正确定位国家目标，二是没有锻造技术、经济和军事综合体。在商业资本主义的世界时代，清朝其实是大地主、老员外式的小农经济体。内部是进贡型的经济体制，外部是进贡型的外交体制。而外部世界是强强间的交易型，强弱间的掠夺、吞并型的国家关系。晚清没有认清世界大势，及时变革自己国家的生产关系和统治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交往变成了对撞，此时西方有如发动机驱动的钢铁战车，而清朝如骡马拖拉的木质板车，被撞得落花流水，则自然而然。

甲午战败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是外力的突然介入打断了循序渐进的

现代化改革，进而引发内部暴力革命和军阀混战，又招致外敌更大规模入侵，形成了“内忧”与“外患”的恶性循环。

致力于图强的中国改革运动，却被同样致力于图强的日本改革者遏止于半途，恰恰证明了中国自身改革存在的问题，不仅不足以自强，反而是自弱、自寻死路。

这是一个昂贵无比的教训：没有顶层设计的改革是没有方向的行军。

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发端的《五条誓文》（1868年），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路径：1.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 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4. 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5.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而相比之下，清帝国的改革，不仅缺少类似的宣示，甚至缺少类似的构思，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中日两国的改革，因此在动员民意、获取民众支持方面，有了巨大的差异。

日本的改革，首先致力于改造整个国家机器，而清朝中国的改革，则依然依靠、拼命修补已经运转数千年之老旧官僚机器，最终在外部强击、内部扭曲的各种畸形而强劲的冲力作用下，轰然解体。明治维新区别于洋务运动的显著特征，一在于日本推行了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令国民对国家事务有更高的参与程度，及时释放了社会的积怨，减少了内耗，转化为正力；二是大力推行了义务教育，提升全民素质，政府以有限的经费，一方面资助官员、贵族们出国考察，另一方面大力推行基础教育，通过教育打通不同阶级的隔栏，为中下阶级，尤其是中下武士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提供了空间。

清帝国由官僚与买办主导的“洋务运动”，既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根本没有跻身列强、驱逐强虏、争衡天下的想法，又在操作层面上，试图走捷径，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局部，截取嫁接到已经千疮百孔的封建统治机器上，因此难以形成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日两种不同改革“大考”的结果，也是近代中国改革失误所招致的时代报复。没有章法的国家改革，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更错失了短暂的战略机遇期，最终万劫不复。

而日本则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按照三位一体的改革方针，完成全面革新后，又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政策，将变革维新激发出来的民族张力，引向域外。

财富是大国之体，而军事和工业则是现代强国之双翼。改革是系统工程，只停留在引进科技和工厂的器物层面及经济层面，不仅不会转型成功，反而会加速社会倾覆，是速亡之道。这在甲午战争中，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全民性的贪图安逸，体现在战场上，是贪生怕死；体现在生活中，则是拜金主义横行，精神萎靡不振。而全民腐败必将导致全军腐败，这是国家败亡的征兆。不能根治腐败，既没有改革的成功，也不可能实现强军的实现。如身患重病和满身溃烂之人不足以驰骋疆场的原理一样，一旦富与强无法保持同步前进，财富只能增加强盗的觊觎之心。财富永远无法保护财富，这是历史的铁律。甲午战争前，中国的 GDP 总值是世界第一，但毫无用处。因为这个 GDP 只有纸面上的意义，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大部分 GDP 就地形成又就地消耗，根本无法

转换成战斗力。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后来总结黄海海战时写道：“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于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

改革本应该激发国民精神，强大国家意志，强壮国力实体，对外展示并使用实力，结果却演变成一场全民逐利运动。经济成了一头 GDP 肥猪，徒惹得虎狼动猎食之念，而吏治腐败及整个社会的腐败也在此过程中同步完成，内无骨头外无骨气，信仰全失，民心荡然，无序的改革造成“上下交征利”，官民矛盾对立；改革的过程，遂成为国民精神自我解体、官僚统治体系自我解体、国家自我解体的过程。

整体形势已经非常不利，清政府高层又毫无危机意识。官僚阶层以粉饰太平为己任，李鸿章自命为帝国裱糊匠，慈禧则一心要住新宅子，过空前奢华的大寿。就在日本大力发展军备的同时，清廷却挪用军费，搞了一个当年最大的房地产项目——颐和园。怎么期待这样的一群“肉食者”能捍卫国权呢？

大国博弈，靠的是有效实力，就是能转换为军事能力的技术和设施。

军队决战，靠的是有效战士，就是不怕死的战士。一般性的数量没有用。

军队平时就要公平，采取秦朝那样的军功制，不能任人唯亲，都是裙带，平时占据高位，战时带头逃跑。

解决办法是有的，就是三大民主。什么是信仰？政府对老百姓好，

他信你，仰视你，就是信仰；你骗他，欺负他，他就不信你了。

腐败腐败，腐了，结果就是败。第一次甲午战争让中华民族警醒，于是有了第二个甲午年中国的辉煌胜利。抗美援朝战争那是日本没赶上，要是日军上去了，他们败得更惨。中国把美国都打裁了，而美军是把日军打裁了的。

在2014年第三个甲午年到了的时候，中国面前有两个甲午年可供参考。一个是1894年，一个是1954年。

洋务运动越发展，对外依赖越严重。不自力更生何来独立自主？

将帅不才，累死三军。这个“累”有连累的意思，就是害死三军。

中国富裕，人多；中国人听话，勇敢，勤劳。这些要素，随便给当时的一个国家，都可以轻松征服世界。但到了晚清这帮窝囊废手里，居然搞成那个样子。晚清土鳖加海龟，都没有认清当时的世界是海洋政治而不是幻觉中的金鱼缸政治。

甲午战争，是一系列失败中的一次，只是败给了日本。之前的鸦片战争，之后的八国联军，更远的时候，欧洲内战，中国一点儿都不关心。

三、不谙西方丛林法则，固守传统书生义理，军事变革儿戏化。不主动遏制战略威胁，致使被动迎接战争，代价惨重

西洋列强的崛起，是血与火的崛起。他们缔造的是食肉性帝国。美洲印第安人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说明。

而当时的中国，却在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天朝迷梦中，成为一个疾病

缠身的食草性国家。整个精英阶层也严重缺乏尚武精神，沉溺于时文小楷的世界中，满足于所学非所用的现实，妄谈“以忠信为甲冑，以礼义为干櫓”，等于是将自身的生存寄希望于虎狼的仁慈。而日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是新的战国时代，要全力以赴地争生存。

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会谈时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

三年后，恭亲王和李鸿章委托来访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帮助调停因琉球问题而日益对立的中日关系。美国的调停被日本拒绝后，格兰特给李鸿章先后写了两封信解释，并明确提出：“我甚盼中国自强。”格兰特的助手杨格将军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也坦率指出：“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他更指出：“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李鸿章后来对此有深刻反省：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很可惜，持此认识者在当时的大清国为凤毛麟角，李鸿章本人的认识也是一知半解，如何应对日本这个威胁，他并不清楚。这个威胁